

马黄河晓蹴冰。直扫幽燕捣辽沈，昌平再告十三陵。”

丘逢甲终日忙于国事，终于积劳成疾，他咯血不止，于1912年2月卒于南京。他在弥留之际，依然魂牵梦绕着故土台湾。他特意嘱托家人将他的墓穴面向台湾，意“吾不忘台湾也”。是啊，丘逢甲在大陆这些年。又何曾有一日淡忘过台湾？

丘逢甲是杰出的爱国诗人，一生写诗数千首，遗著《岭云海日楼诗钞》12卷，饱含悲愤与辛酸，充满渴盼民族统一国家独立富强的爱国情怀。作为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没有止于言论，而是组织义军，并倾尽家财以充军饷，深受人民爱戴。他兴办教育以利国强，培养了许多革命人才，为世人敬重。

台湾海峡依旧隔断大陆台湾，但滚滚海水又怎么能隔断两岸人民难以割舍的血肉之情！丘逢甲的名字，也与他深沉的爱国情和不朽的诗篇根植于两岸人民的心中。

50. 爱国留学生容闳

容闳，字达萌，号纯甫，1828年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一个贫民家庭。七岁时，他在澳门一所英国传教士办的小学学英文，后又在美国人塞缪尔·布朗办的马礼逊学堂读书。1847年，容闳因家境困苦，为求生计，志愿随布朗夫妇到美国。两年后考取了著名的耶鲁大学，成为该校第一个中国学生。

在美国读书期间，西方迅速发展的自然科学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使他大开眼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精神，也激发起他的思考和追求。随着学识的增长，他日益看清了当时中国清朝政府的腐败，忧国忧民之心与日俱增。他决心发奋读书，以后好为祖国服务。他刻苦钻研，常常攻读到深夜。一位朋友问：“是什么力量使你坚持努力学习的？”容闳笑笑说：“到了外国以后，发觉外国人对待留学生，总是着眼于我们的祖国。国家强盛，脸上有光。中国被一些外国人视为‘东亚病夫’，对中国留学生也傲慢

无礼。但我一直以黑头发黄皮肤为荣，并立志要为祖国争气。”正是这种民族自尊心支持着他努力学习。

1854年，容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由于他学业上的显著成绩，美国人不只一次地用优厚的待遇诱劝他留下来。可是，这些引诱丝毫不能动摇容闳的爱国心，他要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贡献给祖国。他要实现把西方先进文化传入中国的愿望，“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1855年，满怀报国之志的容闳回到祖国，但并未受到腐败清政府的重用。容闳只好四处奔波，寻找工作。开始，他在香港高等审判厅当译员，同时研究法律，准备当律师。当时的香港律师界全由英国人垄断，他们看不起容闳这样一个华人。容闳无法忍受他们的刁难，被迫辞职。1856年，容闳到上海海关担任翻译。一天，他问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我在海关奉职，将来是否也有可能升任总税务司？”李泰国却回答：“只要是中国人，无论何人，绝不能有此希望。”容闳听后，非常气愤，心想：我是中国人，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为什么反而不能与洋人享受同等待遇呢！他毅然提出辞职，离开了海关。

后来，容闳又到一公司当翻译，虽然不愁生活之温饱，但他总感到四顾茫茫，报国无门，常常陷入深深的沉思。他想起在同外商的交往中，中国由于缺乏专门人材而深蒙不利，许多应该由中国人掌握的职务，却大部分被外国人控制。想到这些，容闳不禁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愤怒，也为中国缺乏新式人才而感到不安。

在容闳看来，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缺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他认为，只有培养出一批思想开朗、学识高深的强干之士，中国才能够强盛起来。于是，他将自己的一腔爱国热情完全倾注于优秀人才的培养上。

1872年，容闳的计划终于得以实施，请政府同意每年向美国派出三十名留学生，连派四年，在美学习科学技术。容闳对这些学生寄予无限期望，希望他们能够学成归国，为祖国的繁荣、富

强做出贡献。但封建顽固分子对学生们接受西方新鲜事物和思想非常不满，把中国学生留学外洋视为离经叛道之举。1881年，赴美留学生全部撤回中国，容闳精心筹划的教育救国计划付诸东流。但在这批中途归国的学生中，仍有许多人成为国家的人才，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便是其中之一。

容闳还竭力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其中最著名的是力阻贩卖华工。1873年，秘鲁政府派特使来华，要求与清政府签订关于招募华工赴秘鲁的条约。清政府派容闳与秘鲁特使谈判。秘鲁特使想象着中国官员一定会赞成他的主张，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然而一走进客厅，他的心头顿时一紧。原来他以为清朝官员定会对他毕恭毕敬，可眼前这位中国人有一股凛然正气，眉宇间透着威严。他赶紧装出一副客气的样子说：“华工到秘鲁将会受到优厚的待遇”。这时，许多被贩卖到古巴、秘鲁等地的华工，发辫被拴在一起，排成长长的一列，被贩子们像牛马般地牵来牵去，象货物那样叫喊拍卖的情景顿时浮现在容闳的面前。容闳把上述亲闻亲见的事实严正地向秘鲁特使指了出来。秘鲁特使却笑嘻嘻地说：“先生是否搞错了？到秘鲁去的华工待遇都很优厚的”。容闳再也无法忍受了，一腔义愤便如火似地喷出：“什么优厚待遇？不过是给你们增添牛马而已。对于如此野蛮的条约，我不但不能与你签订，还要力阻朝廷在这种严重损害中国和民族利益的条约上签字。”秘鲁特使还欲狡辩，容闳已拂袖而去。为证明自己的看法，容闳又出洋实地考察。经过调查，容闳深深感到被贩卖的华工是生活在人间地狱之中。为了使清政府和祖国人民了解被贩卖华工的悲惨遭遇，不让这种悲剧重演，他将华工身上被笞、被烙的斑斑伤痕拍成照片，作为奴隶主残暴虐待华工的物证。容闳尽力报效祖国，用心可谓良苦。

甲午战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清政府的腐朽和无能也引起了国人公愤，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方兴未艾。历尽坎坷、屡遭挫折的容闳对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面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结识了维新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经常和他们讨论

救亡图存的方略。容闳的政治见解对康有为、梁启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在北京的住所成为维新派领袖们讨论问题的场所。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容闳避居上海。维新志士唐才常来到上海，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容闳积极参与，被推举为“中国议会”会长。不久，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不幸遇难，容闳逃往香港。

在遭受了多次挫折和打击之后，容闳不仅对清政府的幻想破灭了，而且对帝国主义帮助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面目也看得更清楚了。他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开始瞩目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明确表示支持。他认为只有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才能给中国的进步开辟道路。1902年，容闳再度赴美。他广泛联系美国的华侨，支援中国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他也曾劝说一些美国友人给中国革命以支持。1909年，孙中山与容闳在美国相见，他们共同商讨了武装起义的计划，容闳承担了筹款任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经过多年奋斗，终于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取得初步胜利。身患重病，83岁高龄的容闳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他稍能写作时，立即致函全体革命者，满怀深情地说：“你们代表了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那些近二百年来深受压制的人们——高呼着共和国，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去赢得自由和独立”。同时，他还告诫革命党人，必须对袁世凯保持警惕，防止断送革命成果。

孙中山高度评价容闳的爱国精神和革命业绩，称他是覆清朝专制，“建伟大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幸福”的老同志，并致函容闳，希望他归国投身民国的建设。容闳对此深感欣慰，但遗憾的是他已卧床不起了。1912年4月21日，容闳在美国逝世，享年84岁。

容闳一生中的许多时光是在美国度过的，但赤心一直眷恋着祖国和养育他的中华民族。怀着对自己祖国的特殊情感，他孜孜不倦，为发展祖国的教育和实业，为促进祖国的政治进步、为古老中华的振兴贡献了全部力量。他不愧为一个优秀的爱国主义者。